

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历史演进、 基本经验及生成逻辑^{*}

叶淑兰

摘 要：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经历了外交承认的获得与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话语权的生成、国际认同度的提高与全方位外交格局的形成、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与新型全球治理实践的发展三个阶段。考察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历史演进、基本经验与生成逻辑，不仅对于推动改变当前国际舆论“西强中弱”格局，进一步推动国际战略力量“西降东升”发展趋势，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其本质和特点：一是高科技驱动的国家硬实力与价值观驱动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话语权生成的基础；二是在外交实践与融通中外基础上创新外交理论体系是话语权提升的关键；三是拓展人民外交、国际组织外交与媒体外交等多元外交形式是话语权提升的保证；四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真诚重义与和平中庸的外交风格是话语权建设的助力。本文认为，外交话语转化为话语权需要满足被听闻、被回应、被认同、被实践等条件，需要遵循外交话语权的生成逻辑，在国家实力基础上加强话语构建、翻译、传播“一体化”建设，通过阴阳共生与多元结构思维相结合的方式跨越中西“话语鸿沟”，并在此基础上生成新型的全球性话语，借此提升我国的战略性外交话语权与制度性话语权。

关键词：外交话语权 中国外交 话语权 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21)05-0053-78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外交在加强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外交理念引领力、促进中国方案贡献力以及增强国际机制创设力等方面取得

^{*} 本文是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7ZDA31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观察》编辑部老师们与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论文如有不当之处，一概由笔者负责。

了历史性成就。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①面对当前外交话语在西方国家认同度与说服力相对不足的“短板”问题,中国需要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加强国际话语体系与战略传播体系建设,才能有效提升本国的外交话语权。本文认为,考察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历史演进、基本经验与生成逻辑,对于推动改变当前“西强中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进一步推动“西降东升”的国际战略力量态势发展趋势,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话语权”概念首先由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他认为“话语即权力”。基于这一思想,外交话语权就是通过外交话语而表现出来的权力。因此,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都非常重视本国的外交话语权建设,中国也不例外。面对大国崛起的话语权挑战,中国学者在国际话语权领域深入探索:一些研究在基于中国外交实践基础上探讨话语权的使命、挑战、塑造以及提升路径;^②还有学者从外交价值观引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机制、公共外交等具体领域来探讨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③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历史演进、基本经验及生成逻辑。

一、话语权与中国外交话语权

话语权是指主体通过话语对客体所产生的影响力,尤其体现在促使客体按照自己意图行事的能力方面。话语转化为话语权,需要遵循话语“被听闻、被认同、被实践”的内在逻辑。中国外交话语权是中国外交话语的国际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求是网,登录时间:2021年7月15日。

② 这方面的代表作可参见杨洁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话语权的使命与挑战》,载《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5期,第18-30页;孙吉胜:《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第19-43页;郑长忠:《为世界谋大同而凝聚共识——中国外交话语权提升的逻辑与路径》,载《当代世界》,2019年第9期,第17-22页。

③ 这方面的代表作可参见左凤荣:《习近平外交新理念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年第6期,第5-12页;刘昌明、杨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外交话语到外交话语权》,载《理论学刊》,2019年第4期,第5-13页;张志洲:《金砖机制建设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载《当代世界》,2017年第10期,第38-41页;檀有志:《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国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载《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4期,第62-70页。

影响力的总和，主要包含中国外交的议题设置力、话语说服力与话语实践力等内容。

（一）话语权的基础概念

理解话语权是一个涉及权力、话语的基本概念以及话语与权力的内在逻辑关系的问题。“话语即权力”的命题并非是指话语都能产生话语权，而是强调话语与权力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关系，即话语在权力中形成，并以获取权力为目标。

话语的权力(power)实际上就是话语转化为影响力的过程，也是话语权建设的目标指向。权力通常被定义为一种战胜与支配他者并使他者按照自己的意图而行事的能力。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权力意志。^①对权力的追求是人类的固有属性，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原动力。现实主义者认为权力更多呈现“强迫”与“控制”的特征，是一种“零和游戏”；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则将强制性权力与吸引力权力区分开来，认为除了以强迫与交易为特征的硬权力外，国家也可以通过价值观、文化以及外交政策等软权力来对他者产生吸引力，从而使他者自愿地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②实际上，话语权始终都是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之上，尽管其在表现形态上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软权力。“权”的概念还具有“发展趋势”与“审时度势”整体平衡的意涵，鬼谷子提出要“量天下之权，……度于大小，谋于众寡，称财货有无之数，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辩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③强调在评估对方权力状况之后，再利用“捭阖之道，以阴阳试之”，推动矛盾的转化，带动权力的消长。因此，权力的运行有自己的客观规律，并非总是处于零和对抗关系状态，但通常都是在随势、借势、造势等纵横捭阖之道的基础上进行转化。

话语(discourse)是指在特定语境中通过对语言的运用来表达连贯的意义。它与语言、言语的概念之间具有密切关系，但话语更为强调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因素。1952年，美国语言学家哈里斯(Zellig Harris)在《语言》(Language)期刊上首次提出了“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术

① [法]吉尔·德勒兹著，周颖、刘玉宇译：《尼采与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页。

② 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5.

③ 许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2页。

语，将“话语”置于语境中来考察，着重从社会背景与意义的视角来理解话语行为，探索话语背后的权力及意识形态因素。20世纪80年代，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出现“语言学的转向”。^①外交话语、国际政治话语日益引起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兴趣。

话语不但是社会过程和结构的反映，同时也建构了社会过程和结构。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对现实世界具有建构作用。考察话语一般需要考虑到话语主体、话语客体、话语内容、话语平台与话语效果这五个方面的要素。鉴于话语可以被不同的话语客体所解构，因此不同话语客体对同样的话语内容通常都存在不同的解读，这主要受制于话语客体所特有的身份、利益、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等因素。

话语权是建立在一定硬权力基础上的软权力，是衡量一个国家软硬实力的主要依据。最先把“话语权”（discourse power）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提出的法国思想家福柯指出：“话语并非仅是斗争或控制系统的记录，亦存在为了话语及用话语而进行的斗争”。^②话语权涉及说话权、发言权，本质上是关于一个社会中的“话语”资源的分配问题。^③话语权是主体表达自我用以影响客体的权力，在主客体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它可能表现为一种强者对弱者的支配、控制与吸引，也可能呈现的是弱者对强者优势地位的斗争与反抗以及谋求平等对话的权利。当话语主客体实力相对均衡时，话语互动双方则更多以一种平等交流的方式呈现出来。1992年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话语理性与民主的概念，认为“取得一致”（即取得理解）是人类语言本身的“内在终极目的”，而话语伦理则体现权利与权力的对等或平等，理想的话语对所有参与者都是公平的。^④因此，话语权既可能呈现出一种“话语霸权”的状态，也可能呈现“话语民主”状态，但更多的时候则处于“霸权”与“民主”之间的中间状态。

在国际关系中，如果话语没有得到受众的回应与认同，就无法产生影响他国受众的外交话语权；只有话语对他国受众产生议题设置力、话语说服力

① 吴瑛：《中国话语权生产机制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4页。

② 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③ 冷松：《新形势下媒体国际传播与话语权竞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④ [英] 迈克尔·H. 莱斯诺夫著，冯克利译：《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80-403页。

以及话语实践力并且影响了他们的认同与实践的时候,话语权才真正得以产生。因此,话语权可以具体表现为资源定价权、金融控制权、议程设置权、规则制定权以及对国际争端事件的解说权与评判权等,并且可以从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权力争夺说”、以“国际传播活动”为主的“媒介传播说”以及“意识形态说”“对外交流说”“体系结构说”等多种角度来进行考察和研究。^①

(二) 中国外交话语权

外交话语“是外交实体,主要是主权国家,为表达自己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所使用的语言”。它主要“存在于国家的正式文件、领导人讲话和国家间的条约、协议、公报、声明和宣言之中”。^②不断提升话语权并实现外交话语权的平等是中国外交话语建构的目标指向。杨洁勉提出要加强外交话语权建设,并对“外交话语权利”与“外交话语权力”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认为“外交话语权利”是当代国际社会任何主权国家都应当享有的权利,而“外交话语权力”是指一国对他国的感召力、影响力和强迫力等,因此,有“权利”者未必就有“权力”,反之亦然。^③郑长忠则提出从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和组织逻辑三个维度上来推动中国外交话语权的提升。^④概而言之,外交话语权是国际话语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国家实力的综合体现,是争取外交话语权利与推动外交话语产生国际影响力、吸引力与号召力的总和,具体表现为话语传播层面的议题设置力与传播辐射力,话语认同层面的理念引领力与形象亲和力,以及话语实践层面的方案倡议力与机制创设力。

中国外交话语权目标的实现主要建立在大国身份基础之上。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指出,身份是“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⑤但是,外交话语权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国家软硬实力的基础之上,而大国身份则有助于夯实外

① 吴贤军:《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理论、现状和路径》,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20页。

② 陈以定:《中国外交观念演进的话语视角》,载《长江论坛》,2011年第5期,第52页。

③ 杨洁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话语权的使命与挑战》,第24页。

④ 郑长忠:《为世界谋大同而凝聚共识——中国外交话语权提升的逻辑与路径》,第18页。

⑤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220页、第22页(“译者前言”部分)。

交话语权的基础。中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大国，其大国身份规定了其外交话语与外交行为的利益属性与发展方向。在近代史上，中国的大国身份虽未改变，但是从“强大”走向了“弱大”，“大”而“弱”形成鲜明反差，甚至一度呈现出“弱国无外交”的悲惨局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以独立自主的大国身份走向世界舞台，开始了独立、和平、开放的大国外交探索。

然而，当不断崛起的中国以大国身份与外界共处的時候，国际社会却充斥着“国强必霸”的现实主义思维，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必然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尤其是当中国与周边国家出现领土主权冲突的时候，更容易被西方大国和周边国家扣上“大国威胁论”“大国原罪论”的帽子。众所周知，在话语权博弈过程中，小国有时更容易博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反而可能出现“以小胜大”“以弱欺强”的不利于大国的局面，形成所谓的话语权领域的“大国身份困境”。这说明，我们在推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过程中，充分展现中国特色的新型大国身份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要像居于江河下游那样，拥有容纳天下百川的胸怀。”^①因此，中国特色的大国身份构建要更加重视大国内在价值理念与精神气质的构建，更多地呈现精神世界的伟大、大度的一面，同时不断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情感认同。

中国外交话语权是在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进程中构建起来的，具有关系性与构建性特征。由于这种双向的交往互动始终都受制于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以及“西强中弱”的国际舆论环境，因而决定了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必须突出抗争性与突围性的特征。众所周知，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长期占据话语主导权，通过不断创设新的对华话语，使中国陷入西方话语陷阱之中。西方与中国的话语互动存在明显的“攻击—辩解”或“攻击—怒怼”的行为模式以及“恐惧—愤怒”的心理模式。^②西方出于对中国崛起与权力转移的恐惧，在对华话语中呈现出一种攻击者姿态，极易引发中国的愤怒或怒怼。这几乎形成一种难以打破的无意识模式，需要我们加以省察与改变，以便及早走出这一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新兴市场国家整体性崛起的进程中，权力转移出现“西降东升”的势头，为中国外交话语权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04页。

② 叶淑兰：《中西有关“中国形象”话语互动探析》，载《国际论坛》，2012年第6期，第39—44页。

建设取得突破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一方面,伴随着“一带一路”全面“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快,中国开展国际交往互动的广度、频度与强度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以企业、组织、公民为主体的国际交往大军异军突起;另一方面,智库、媒体、公众等主体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中来,而社交媒体的发展则为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带来了一个更为复杂和国际化的网络化结构愿景,要求中国在此方面不断提升和完善战略协调性与机制体系性。

二、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历史演进

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经历了外交承认的获得与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话语权的生成、国际认同度的提高与全方位外交格局的形成、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与新型全球治理实践发展等历史进程。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通过三次建交浪潮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建立在“三个世界”理论基础上的反霸国际统一战线话语,为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全面融入国际社会过程中,积极倡导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等理念,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中国提出了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一带一路”等倡议,有力地推动了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与新型全球治理实践的发展,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对国际社会的塑造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一)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1949-1978年): 外交承认的获得与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话语权的生成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的成就突出表现在广泛的外交承认的获得与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话语权的生成上。通过奉行“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外交政策,中国首先获得了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与部分不同意识形态国家的外交承认;通过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三个世界”理论,中国有效地提升了其在新兴独立国家中的话语权,并建立起了反霸国际统一战线话语权。

第一,“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话语对建交实践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新中国成立后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与新政权的安全。中国提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

再请客”的政策，表示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的各种外交关系，要坚决废除所有外国在华拥有的特权，并在平等、互利与相互尊重主权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其他国家谈判建立新的外交关系。^①这些政策推动了第一次建交浪潮的到来。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建交的国家。到1950年1月，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国、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先后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②1955年4月前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亚洲有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五个国家。上世纪50年代前期，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等欧洲国家也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③70年代初，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也先后同中国建交，同时，英国、荷兰同中国的关系也由“代办级”升格为大使级。中国通过“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话语，推动了三次建交浪潮，不仅让自己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外交承认，而且也赢得了独立自主与平等的外交话语权利。

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中国在新兴独立国家中话语权不断提升。195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了中印、中缅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之中。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确立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其中就吸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这一时期，中国通过采取不争论、求同存异的策略，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避免了不必要的意识形态争论。特别是，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在国际社会尤其是亚非新独立国家中的影响力和外交话语权。^④一是有将近20个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表示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了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

① 黄安庆：《新中国外交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② 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9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③ 同上。

④ 张屹峰：《万隆会议与新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建构》，载《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2期，第11-12页。

议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宣言》以及《各国经济权利义务宪章》之中；^①三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开始运用于处理与第三世界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后来超越了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开始运用于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第三，基于“三个世界”战略思想之上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话语权开始生成。新中国成立“前30年间，中国外交重点在于维护以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利益”。^②中国首先实行“联苏反美”战略，确保了社会主义政权安全。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苏联侵犯中国主权，中国展开了“反帝必反修”的斗争。毛泽东提出了“两个拳头打人”“反帝必反修”“第三种力量”“第二中间地带理论”“一条线”“一大片”“三个世界”等话语，旨在不同时期团结国际社会中的中间力量，反对美苏霸权主义。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Kenneth David Kaunda）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③“三个世界”理论与反霸统一战线话语权的形成，对于中国团结国际社会中的中间力量，争取外交话语盟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中国外交话语影响力更多体现在对新兴独立国家的影响上，但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较小。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主要体现在争取中国独立与平等的国际地位、维护社会主义政权，以及获得外交承认上，更多表现为对美苏的抗争以及争取国家平等权利的斗争。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2012年）：国际认同度的提高与全方位外交格局的形成

1978年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地融入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并更加具有合作精神”。^④这一时期，中国外

① 孙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话语权分析——兼论当代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发展》，载《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10期，第91-92页。

② 郭树勇：《试论70年来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载《国际观察》，2019年第4期，第20页。

③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442页。

④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2003, p.5.

交话语权建设集中体现在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与国际合作认同度的提高与“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全方位外交格局的形成上面。中国提出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话语，推动全方位外交实践不断向前发展，有助于提升中国外交的议题设置力与话语影响力。

第一，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话语推动改革开放外交实践不断深入发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国际秩序观首次发生变迁的重要转折点”，中国“成为国际秩序中的重要‘融入者’”。^①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两大主题的判断，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决定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认为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而南北问题则是核心问题。^②1986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一次把中国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来调整外交格局和对外关系，促成了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与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与周边国家的睦邻伙伴关系以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也得到良好的发展，开创了外交新局面。冷战结束后，邓小平在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基础上，确立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巧妙地与西方国家进行周旋，使中国较快地走出了被西方国家“经济制裁”的困局，推动外交实践不断向前发展。

第二，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话语促进了全方位外交实践的发展。冷战结束后，江泽民指出，“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③他还指出，“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保证各国和睦相处、相互尊重”，“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凝聚各国人民的力量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④中国提出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新安全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外交理念得到了俄罗斯及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有效促进了中国全方位

① 郭树勇：《论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全球观念变迁的主要规律》，载《国际观察》，2021年第1期，第10页。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

③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test/2008-07/04/content_1035850_4.htm，登录时间：2021年8月15日。

④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4页。

外交实践的发展。中国与俄罗斯、美国等建立了“不针对第三者”的大国伙伴关系，同时采取了“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的开放战略，帮助东南亚国家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在10+1、10+3、东亚峰会等东亚地区合作机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第三，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话语帮助中国不断提升外交议题设置力。2004年中国提出和平发展的概念，2005年发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进行了全面阐述。和平发展解答了中国将走向何处的课题，而“和谐世界”则提出了中国对于未来国际社会建设的构想。2005年中国领导人在出席亚非峰会时指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①同年，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睦邻、安邻、富邻”等话语有利于对冲国际社会所谓“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影响，并促使一些理性的人们提出了“中国责任论”“利益攸关者”等概念。这说明中国影响国际机制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2008年后，“中国的国际组织外交也开始呈现引领性的新特点”，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不断增大，例如，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第三大股东国，投票权分别上升到4.42%与6%。^②总之，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外交话语提升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议题设置能力，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目标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但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仍心存疑虑。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至今）：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与新型全球治理实践的发展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在新时代提出了以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推动中国外交实践朝着更加“奋发有为”的方向前进。新时代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的成就突出表现为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与新型全球治理实践的发展。皮尤中心2020年10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有48%的被调查者认为中

① 《与时俱进 继往开来 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光明网，https://www.gmw.cn/01gmrb/2005-04/23/content_221100.htm，登录时间：2021年8月15日。

② 张贵洪、王悦：《论当代中国特色国际组织外交的主要特点——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例》，载《国际观察》，2020年第4期，第87页。

国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比认为美国是全球经济领导者的比例要高出14%。^①这充分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领导力认同的大幅提升。中国通过提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话语，有力推动了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与新型全球治理实践的发展。

第一，新型国际关系话语不断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实践向前发展。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了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其内涵不仅包括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还包括“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以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思想，体现了平等、民主的政治秩序观，发展、共赢的经济秩序观以及开放、包容的文化秩序观。新型国际关系的“新”就在于它是一种“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关系，跳出了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旧框架，反映了中国国际结构观中的“线”“带”“片”思维以及中国文化基因里“以和为贵”的精神。新型国际关系话语有力地推动了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立，中俄关系因而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中国对周边国家抱着“亲、诚、惠、容”的理念，对非洲国家抱着“真、实、亲、诚”的理念，以正确的义利观为引领，不断推动睦邻外交以及与发展中国家外交关系的发展；在联合国与G20等国际机制平台中，中国积极打造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不断提升中国外交理念引领力。习近平指出，“各国利益交融、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②为此，中国提出了要同所有世界其他国家一道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一理想目标。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倡议。显然，建立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之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提出有助于提升中国外交理念引领力，并为“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治理实践提供价值基础。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二十国集团等

① Laura Silver, Kat Devlin and Christine Huang, “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a Reach Historic Highs in Many Countries,” *Pew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6,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0/10/06/unfavorable-views-of-china-reach-historic-highs-in-many-countries/>, 登录时间：2021年5月16日。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

各种多边国际场合中被阐述，还多次写入包括联合国“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文件之中。

第三，“一带一路”等外交倡议推动新型全球治理实践进程向前发展。新时代中国更加强调“为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①中国不仅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而且还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政策。截至2020年3月，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和地区共有65个。据国家发改委2019年4月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已与125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3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②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金砖+”模式、解决朝核问题的“双暂停”倡议和“双轨并进”思路，处理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以及应对疫情的联防联控合作机制，均对新型全球治理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中国首次倡议成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投行成为现有国际金融机制的有益补充，对于推动全球金融治理模式的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纵观中国外交话语权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外交话语权从争取“获得外交承认”与“国际认同”的“外交话语权利”建设，逐步走向以影响与塑造国际社会为特征的“外交话语权力”建设。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倡议正在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力。伴随着权力转移，中美话语较量与竞争将会以更为显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既是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效果的呈现，同时也镜映出当下话语权建设中存在的短板问题，为未来话语权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与任务。

三、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的基本经验

提升中国外交话语权，需要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推陈出新。考察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的历史与现实，可以让我们认识到：高科技驱动的国家硬实力与价值观驱动的文化软实力是话语权生成的基础；在外交实践与融通中外基础上创新中国外交理论体系是提升中国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2页。

② 《发改委：我国已与125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173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北青网，https://www.sohu.com/a/308739203_255783，登录时间：2021年6月9日。

外交话语权的关键；拓展人民外交、国际组织外交与媒体外交等多元外交形式是话语权提升的保证；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真诚重义与和平中庸的大国外交风格是话语权建设的助力。

（一）高科技驱动的国家硬实力与价值观驱动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国外交话语权生成的基础

中国近现代外交最为深刻的教训是“弱国无外交”，即在权力政治面前，弱国没有平等的外交与外交话语权。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获得外交承认、改革开放时期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到新时代中国影响与塑造国际社会的能力不断增强，这些历史变化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密不可分，充分说明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显然，坚持发展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下形成稳定的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推动国内大循环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的形成，是中国外交话语权生成的前提条件。邓小平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提升国家硬实力的前提条件，有助于中国提升外交话语权。历史经验要求我们进一步打造“一带一路”科技命运共同体，运用市场规则的力量创新高科技发展投资模式，建设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同时还要加大重大技术协同攻关力度，力求在基础研究、5G数字通信、人工智能和生物等领域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这样才有助于国家实力的全面提升。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理论等中国外交话语的影响力来自于“和”文化的吸引力以及毛泽东思想的魅力。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有赖于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充分发挥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精神，以多元结构思维超越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

鉴于话语权建设涉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反求诸己”的精神因而是突破话语困境的一个有效途径。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外交面临困局，冷战结束之初又面临来自西方的国际制裁与孤立，但是中国外交依靠“反求诸己”的精神以及灵活自我调整能力，很快走出了困境。当下“反求诸己”需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与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加强外交与宣传人才队伍建设，在全面总结民族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效处理“台独”“港独”“疆独”等积重难返的问题，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在反恐、反核扩散、健康卫生、环境气候等全球治理问题中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倡议与中国方案。在阿富汗、伊朗、缅甸等冲突问题上，中国

应当积极发挥调停外交、穿梭外交与斡旋外交作用，借此不断提升中国的外交话语权。

（二）在外交实践与融通中外基础上创新中国外交理论体系是中国外交话语权得以不断提升的关键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外交话语因为其本身具有的包容性以及价值的共通性，很快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认同。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的关键在于和平发展、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理论创新，而国家身份、核心价值观与外交战略因其对外交实践具有全局性影响，一直是外交理论创新的焦点。

首先，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中国提出的“一边倒”、三个世界、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平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等话语都是建立在中国丰富的外交实践的基础之上。其次，中国外交理论创新根植于从古代到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历史发展的丰富土壤中。例如：中国古代治疆、治边的智慧与思想在加以概括、提炼之后可以创造性地运用于解决当今的民族边疆事务之中；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天下”“仁”“道”“义”“利”“势”“易”等概念以及“天人合一”“和平共处”“阴阳共生”“求同存异”等思想，在对其进一步加以学术化与理论化之后，将会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再次，中国外交理论创新需要建立在积极借鉴世界主要大国成长的历史经验及其国家形象与话语权建构的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阎学通教授提出的道义现实主义、秦亚青教授提出过程建构主义，都是在借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并对其进行了创新性发展，突显了中国特色。^①最后，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与借鉴，有助于中国外交理论的构建真正做到“融通中外”。此外，外交理论创新还需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跨学科与融学科研究的发展，需要加强理论一体化建设与跨学科交叉研究。

（三）拓展人民外交、国际组织外交与媒体外交等多元外交形式是中国外交话语权不断提升的保证

首先，人民外交、民间外交在中国与美国处于外交隔绝状态时期对于

^① 参见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102-128页；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86页。

推动双边外交关系的改善可以发挥重要的“自下而上”的破冰作用。例如，1971年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起到了“小球推动大球”的效果。这意味着把体育外交、音乐外交、电影外交等元素融入人民外交之中，可以收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它给予我们的重要历史启示是，在当前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推动科技“脱钩”的背景下，我们要勇于创新人民外交的丰富内涵与多元形式，充分借助美国国内资本技术因素并运用相关企业与利益团体的力量，同时加强与美国智库、学者之间的对话沟通，向美国政府施压与游说，敦促美国撤销包括打压中国所谓“涉军工企业”等内容的用来制衡中国的政策措施。

其次，多边外交场合是中国提升外交话语权的重要舞台。例如，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成为了新中国外交话语的高效扩散平台，而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则是中国外交话语权得到大幅提升的表现。显然，加强中国外交话语权需要继续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进一步拓展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等多边平台，同时我们还可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东亚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国际多边舞台上更好地传播中国外交话语。

最后，在高科技发展的驱动下，当前表现和提升外交话语权的方式开始呈现个体传播、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相结合的多元传播模式，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提升外交话语权的崭新平台。鉴于此，充分发挥媒体外交与网络外交的优势，打造中国对外媒体旗舰队，加强与国外媒体的合作，深化中外记者的访问交流，推动记者“走出去”与“引进来”，加强外交话语在地化（localization）、分众化（demassification）与精准化的传播，是新时代提升中国外交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四）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真诚重义与和平中庸的大国外交风格是话语权建设的助力

外交活动不仅是一种实践，也是一门艺术。^①外交风格体现了外交实践具有的独特方式，通常表现为该国外交的某种特质、格调或品位，有时也表现为某种具有独特精神内涵的外交行为方式。^②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

① 杨公素、张植荣：《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

② 张鸿石：《论国家的外交风格及其作用》，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3期，第97页。

化，中国领导人表现出了非常独特的以和为贵、求同存异、以理服人的外交理性以及重视对中国象形文字、古诗词的生动性与形象性运用的语言表达风格。毛泽东分别于1973年与1974年提出的“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构想，与当今“一带一路”倡议无论在外交战略布局还是数字语言的形象表达上均有神似之处。

中国外交具有鲜明的“大国风范”“大国风度”“大国气度”与“大国担当”的风格特征，强调真诚、务实、重义的精神特质。1964年周恩来访问非洲时提出了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使亚洲国家较快走出危机。这些都展现了中国外交对义利兼顾、情理交融的价值追求，并与当前西方盛行的现实主义大国霸权思维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谦谦君子形象的大国风范有助于中国团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进而赢得更多的话语“盟友”。

中国传统文化对“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强调要求我们要超越表层的话语与行为，要更加重视“道”的精神实质和人心的向背。也就是说，大国外交风格不仅一定要体现对天下大同、和平中庸的价值追求，而且还要表现出说话算数、重信誉的特质。例如，在大国成长的进程中，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要始终强调求同存异与实事求是的精神，要始终重视关系导向与任务导向的相互结合，要始终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

四、中国外交话语权的生成逻辑

通过分析和总结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历史演进与基本经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外交话语权的生成是在特定的国际政治权力与跨文化语境结构中，在国家软硬实力的基础上，经过外交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的环节，为客体所听闻、认同与实践之后而产生的结果。通过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对比，进一步探究中国外交话语权生成的过程、结构与类型逻辑，有助于我们在理论层面为提升中国外交话语权提供更有力的智力支持。

（一）过程逻辑：在国家实力基础上加强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一体化建设

软硬实力齐头并进的发展无疑有助于提升话语权，但是，话语权并非总能与国家硬实力成正比例增长，如果软实力滞后于硬实力，也会妨碍话语权

的生成。例如，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硬实力还较弱的条件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毛泽东思想构成的文化软实力成为当时中国外交话语权生成的重要因素。现在，伴随着70多年来国家软硬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外交话语的议题设置力、理念引领力、方案贡献力与制度创设力都同步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总的看，中国外交话语权的生成过程是在以中美权力消长为主要特征的国际权力网络以及中外意识形态、价值观差异等跨文化语境中，通过话语主客体的作用与反馈机制，形成的具有话语调整、更新与修正能力的开放话语体系的一个互动过程（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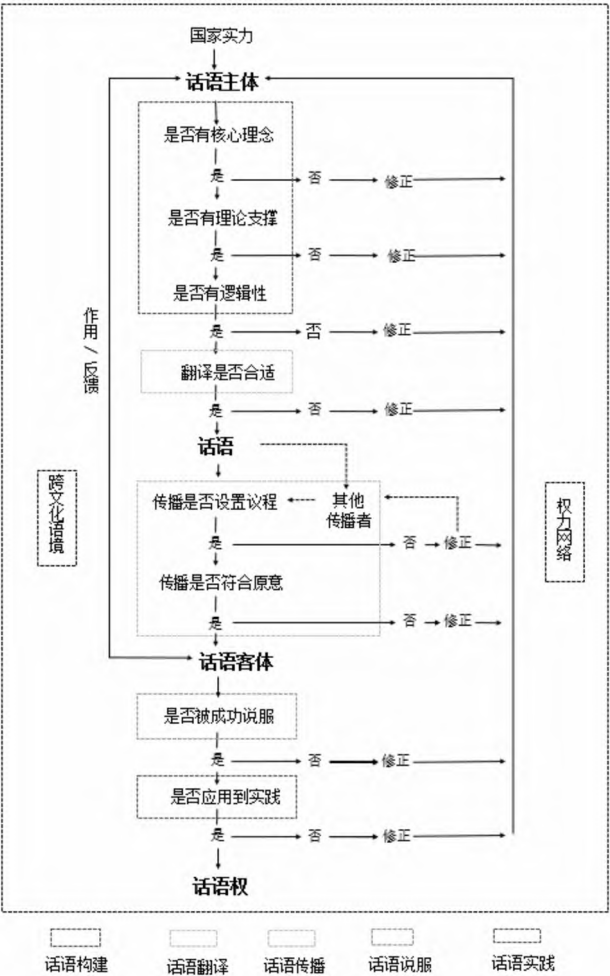


图1 外交话语权生成示意图

核心理念与理论支撑是外交话语权生成的关键因素，因而也是导致中国与西方国家在话语权问题上存在分歧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发展、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语是建立在和平、共赢价值理念的基础之上，与西方建立在“自由”“民主”价值观基础之上的话语体系存在很大差异。也就是说，中国的义利观与美国的权力导向与利益至上的观念、中国的“不结盟”与美国的同盟体系、中国倡导的多极化与美国的霸权体系之间均存在深刻的价值观差异与分歧。因此，中国强调“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话语常常遭到美国“人权价值观”的挑战。

话语构建、传播与翻译的“一体化”建设在话语权生成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外交话语文本构建、话语翻译与话语传播等多个环节存在相互“脱节”的问题，很容易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话语的误读与曲解。例如：中国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后，并没有及时给出相应的英文翻译，因而被外界抢先翻译为“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隐藏能力、假装弱小”（hide one's ability and pretend to be weak）、“隐藏真实目的”（conceal one's true intention）等明显包含负面涵义的词句；^①中国把“一带一路”称为“倡议”（initiative），但西方称之为“战略”（strategy）或“计谋”（scheme）。这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一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外交话语权的生成需要经过话语构建、话语翻译、话语传播、话语说服与话语实践等不同阶段，不仅能是一个多步骤、多环节的过程，更是一个彼此联系、相互兼顾的一体化过程，而并非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其中，话语是否具有核心理念、理论支撑，其逻辑性是否涉及外交话语的核心价值观，是否符合话语理论体系的规律；话语是否被正确地翻译与广泛地传播，是否涉及到外交话语的议题设置力，而客体是否被话语成功说服；等等，则是决定中国外交话语权能否成功生成的重要条件。总之，外交话语转化为话语权需要满足被听闻、被回应、被认同、被实践等前提条件。

纵观话语权的历史演进与生成逻辑，本文认为，未来影响中国外交话语权最为核心的因素可以概括为“六个需要”：一是需要共商、共建、共享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二是需要和平发展理论、区域合作

① 赵启正：《通过翻译准确传播“国家关键话语”》，载《光明日报》，2011年8月30日，第13版。

理论、新型国际关系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理论的创新；三是需要外交话语原则性与灵活性“刚柔并济”的结合、话语翻译的“信达雅”、“国际表达”意识的加强等；四是需要提升外交决策机制化、科学化、精准化水平；五是需要加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推动多轨与多元外交的发展；六是需要加强外交人才培养机制化。

（二）结构逻辑：以阴阳共生与多元结构思维跨越中西“话语鸿沟”

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历史演进既反映了主客体之间的经济、军事等物质性结构的变化，也反映了文化、价值观等观念性结构的变化。2010年，中国开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下，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达到美国的70%左右。虽然中国与美国在物质性结构上的距离在缩小，但中国在观念性结构上的滞后状态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众所周知，外交话语权的构建体现自我与他者的话语互动，具有社会性与关系性的结构特征。话语是否能够产生话语权与使用话语主体的地位、话语本身的特性等因素有关。^①正身、正名、名正言顺、言简意赅以及对弦外之音、大音希声等恰到好处的把握是影响话语权生成的重要因素。表现和提升话语权同样“有赖于受众的认同，受众所处的社会语境、其背景知识和情感认知”。^②外交话语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受到中外意识形态与跨文化结构的影响。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与西方所谓的“民主和平论”存在很大的话语张力。中国提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强调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伙伴关系，与西方倡导的基于“自由”价值观基础上的针对第三方的同盟体系形成很大的反差。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作为新型国际合作平台，推动“开放地区主义”不断发展，也不同于西方人的“排他地区主义”思维。这些不同之处不仅非常容易被误读，而且还是西方媒体经常用来刻意歪曲的“把手”。

除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冲突外，中西跨文化差异与冲突也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外交话语权。受到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存在差异的影响，西方始终对中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语持怀疑态度。西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中国新殖

^① 孙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话语权分析——兼论当代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发展》，第90-91页。

^② 孙吉胜、何伟：《国际政治话语的理解、意义生成与接受》，载《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3期，第38页。

民主义论”等话语是建立在基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东方主义框架的基础之上的产物。正如赛义德（Edward W. Said）在《东方学》的题记中引用马克思（Karl Marx）的这句话所说的那样，“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①中国外交话语与西方话语的互动经常出现一种充满张力并难以协调的“话语鸿沟”。中国的“大国风范”“大国担当”与西方的“大国威胁”“大国原罪”形成巨大的话语反差。在中国民主、人权、负责任等问题上，中国与西方有时存在难以跨越的认知冲突与观点撕裂，如果处理不善，话语的“互撕”与“互怼”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

“西方解决矛盾的方式一般是把自己变强，消灭对方；而东方处理问题的方式往往是分解、弱化问题或对手，从一种阴阳和谐的立足点去解决”。^②西方以黑格尔（Georg Hegel）为代表的辩证法和中国的中庸辩证法都强调事物的两极的辩证发展规律，黑格尔辩证法是冲突辩证法，而中庸辩证法则是和谐辩证法。^③面对中西方差异，中国外交话语权的生成需要我们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在“阴阳之道”的统摄下来施展“捭阖之术”的智慧。鬼谷子强调，“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阴阳其和，终始其义”。^④这说明矛盾对立面的转化需要有一种阴阳互补、阴阳调和以及阴阳共生的逻辑。面对西方的东方主义思维框架，需要中国突破西方惯用的中国/西方、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结构思维，不断加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与文化的反思性，同时借鉴与吸纳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培育和发展具有对话性与包容性特征的多元共生结构思维，努力使之成为提升中国外交话语权的有力支撑。

（三）类型逻辑：提升战略性外交话语权与制度性话语权是关键

探究外交话语权的不同类型，抓住关键类型话语权的构建，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首先，我们要高度重视战略性外交话语权与专门性外交话语权的划分问题，要区分清楚外交话语本身是具有全局性意义还是只有

① 周宁：《“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5期，第41页。

② 叶自成：《易经思维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5期，第131页。

③ 秦亚青：《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的几个假定》，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0期，第27页。

④ 许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第17页。

局部性特征。战略性外交话语权关乎国家在外交战略目标、战略定位与战略路径等方面的话语权,具有明确的目标性、全局统摄性及中长期时间性的特征。^①中国提出的“一边倒”、三个世界、多极化、和谐世界、新型国际关系等话语是中国对于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定位的战略构想,而独立自主、不结盟、和平发展等话语则涉及中国外交战略选择。中国强调“反霸”“永不称霸”“韬光养晦”“和平发展”的防范型战略,显然不能为一直强调进攻性战略的美国所理解。西方从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权力转移理论出发,怀疑中国“永不称霸”与和平发展的意图,认为这是中国实力不够强大之时的权益之计。美国学者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提出中国战略文化呈现孔孟文化与强现实主义文化并行的特点,认为中国战略文化强调“权变”,在冲突的关键时刻,中国的应对与西方现实主义思维并没有什么区别。^②也有西方学者认为,当中国获得大国地位时,会与历史上任何其他帝国一样,谋求恢复东亚霸主地位,并扩张其地区影响力。^③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但表现在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意图的怀疑上,还表现在它们怀疑中国战略目标的可操作性上,认为中国缺乏具体的战略路线图。因此,在中美战略互疑、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加强战略定力,创新战略性外交话语的表达,更清晰地向外界传递自身战略目标与可操作的战略路线图,同时加强话语理论体系与战略传播体系建设。

其次,我们还需要加强那些指导某一具体领域的外交工作并只对局部外交产生影响力的专门性外交话语权的建设工作。它主要涉及贸易话语权、金融话语权、科技话语权、环境话语权、气候话语权、人权话语权和安

① 参见叶淑兰:《中国战略性外交话语建构刍议》,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68-81页。

② Johnston Alastair Iai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49.

③ Warren I. Cohen, "China's Ri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0, No. 4-5, August-October 2007, p.683.

以及涉藏话语权等方面的建设。

最后,当前中国外交话语权的提升还需要更多地在制度性话语权中寻求突破,这是提升中国外交话语权的关键因素之一。制度性外交话语权涉及外交话语在外交实践层面中的运用,是话语权目标实现的最终标志,其提升对于改变中国在话语性话语权与结构性话语权方面的不利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例如: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均推动了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上升很快;西方新自由制度主义者一度提出中国是“利益攸关者”的概念,希望通过在国际机制中更多地容纳中国利益的方式来拉拢中国。但是随着中美权力差距的不断拉近,西方现实主义者开始在国际机制中通过同盟体系来打压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加快了融入国际体系的步伐,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开启了影响与塑造国际体系的进程。现在,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有了很大提升,主要体现在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现有国际机制中话语权的提升上,以及对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国际机制的创设上。

总的看,国家软硬实力是外交话语权的基础,但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新安全观、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话语所产生的影响力一直是中国特色的外交话语权得以不断提升的重要软实力来源。

五、结 语

当前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面临国内治理能力有待加强、外交理论创新不足、国际话语体系与战略传播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等短板问题,也面临着来自西方霸权话语以及中西意识形态、价值观与文化差异等方面的问题,对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构成了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中美权力转移与制度竞争进一步加剧,“反华”在美国国内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美国寻求与其他西方国家建立价值观同盟体系,力图通过多边机制对中国形成舆论围堵,导致中国争取话语“盟友”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二是中国在涉及领土主权、人权、宗教等问题上面临着来自西方国家更大的话语挑战,不仅给中国全面提升民族边疆治理水平以及舆情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还对中国提升对外传播的公信力与认同度构成了更大的压力;三是面临社交媒体、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兴起,迷雾技术与反迷雾技术的运用将使得未来的话语权斗争变得更为复杂多变与扑朔迷离,因此在高新技术上

获得主导权将成为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的关键变量之一。

面对话语权建设的老问题与新挑战，我们需要在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历史演进、基本经验与生成逻辑的基础上积极加以回应，不断强化战略前瞻意识，重点改进以下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在大国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强化战略能力、培养战略耐力，以扭转当前“西强中弱”的全球话语权格局。这不仅需要我们运用“差异化思维”和多元结构思维来超越现实主义惯常使用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而且还需要我们秉持求同存异、和平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处理好沉默与言说、话语与行动、理性与感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第二，提升中国外交话语权需要我们打破当前国内治理以及全球治理遇到的各种“瓶颈”，全面提升边疆民族治理水平与舆情治理水平，不断增强高科技驱动的国家硬实力与价值观驱动的文化软实力；在融通中外与外交实践基础上创新大国外交理论，构建国际话语体系，拓展人民外交、国际组织外交与媒体外交等多元外交形式，借此打破西方价值观同盟体系，争取更多的话语“盟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打造真诚重义与和平中庸的大国外交风格，有效加强中国外交话语的公信力、影响力与说服力。第三，加强战略传播协调机制建设，构建国际话语体系与战略传播体系，把“走出去”与“请进来”“自己讲”与“他人讲”、陈情与说理有机结合起来；遵循话语权生成的内在逻辑规律，全面提升战略性外交话语权与制度性话语权，抓住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国外交理论创新、外交话语优化、大国外交实践变革等话语权建设的关键环节，推动外交话语文本建构、话语翻译与话语传播“三位一体”建设；面对一些国家在信息战中运用迷雾技术传播虚假信息的做法，我们需要充分运用高科技创新成果，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反迷雾技术的研发，不断提升有效识别、防范与反制虚假信息攻击的能力。

（作者简介：叶淑兰，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博士，上海，200241）

收稿时间：2021年7月

（责任编辑：全楚利）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Basic Experience and Generation Logic of China's Diplomatic Discursive power

Ye Shulan

Abstract: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hange China's disadvantageous situation compared with the West in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nd promote the discursive power of China by exploring historical evolution, basic experience and generation logic of China's diplomacy discursive powe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diplomatic discursive power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acquisition of diplomatic recognition and the gen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anti-hegemony united front discursive power,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multi-faceted diplomacy, and the promotion of global influence and the new-type global governance practice at each stage. A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China's diplomatic discursive power construction helps us to hav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its ess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First,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hard power driven by high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soft power driven by values is the basis of the generation of discursive power. Second, the innovation of diplomacy theory system based on the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diplomacy practice is the key to achieve diplomatic discursive power. Third, expansion of people's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diplomacy and media diplomacy, and other forms of multiple diplomacies is the assurance of diplomatic discursive power. Fourth, China's diplomatic style of emphasizing sincerity, justice, peace and moderation based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ribu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iplomacy discursive power.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plomacy discourse into discursive power needs to meet the conditions of being heard, responded, recognized, and practiced. Based on the generation logic of diplomatic

discursive power, we should actively build the “trinity” pattern of discourse construction,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bridge the “image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with multi-symbiotic structure thinking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discursive power of China’s strategic diplomacy and its institutional discursive power.

Key Words: Diplomatic Discursive Power; China’s Diplomacy; Discursive Power; Discursive System